

政治与社会译丛

7890 149584123 879846  
18023  
78913  
1046210053871 29846156900159001400012500000000000000  
8700000098660000  
78913  
45911230140  
78001503000

# 后街金融

##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美] 蔡欣怡 著  
何大明 湾志宏 译

最终，温州的私营经济与既对抗正式金融机构，又与之展开竞争的非正式金融机构一起繁荣兴旺，名扬天下，两者都既蔑视正规的金融机构，又与之竞争。当温州的私人金融业在 1980 年代中期引起国内的极大关注时，企业家采用的融资策略也升级换代，从亲友、邻居和当地商人之间特定的无息借贷，演进到更制度化和更有争议的手段，诸如一周七天、一天 24 小时营业的私人钱庄。如果说 1980 年代前期是温州的非政府金融创新期，那么十年后，最初的创新事物正在被温州市的上级行政机关推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所控制、合并或改制。这并不是说，官方的改革政策阻挠了 1990 年代的其他创新发展，而是说，经济行动者活动于其中的市场和金融机构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场变革的最后结果，就是重新为经济游戏制定规则。

# 后街金融

## 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美] 蔡欣怡 著

Kellee S. Tsai

何大明 湾志宏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 in China*, by Kellee S. Tsa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2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 (美) 蔡欣怡著;何大明, 湾志宏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1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3辑)  
书名原文: Back-Alley Banki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SBN 978-7-213-05247-7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0-14号

I. ①后… II. ①蔡… ②何… ③湾… III. ①私营企业-企业管理-  
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692 号

## 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作 者: [美] 蔡欣怡 著 何大明 湾志宏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5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247-7

定 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出版者言

出版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 译丛第三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

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

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 序 言

ix

今天,到中国旅行的人都会看到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喧闹的私营经济。但他们看不到的是,这种增长是如何筹措到资金的。从 1970 年代末,数以千万计的私营企业主在无法获得正式的信贷来源的情况下,启动了他们新兴的事业。他们取得这种不太可能达到的功绩的故事,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并且对于我们思考发展和转型中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深意。中国的企业家们并没有等待北京的官员去认可私营金融机构或为商业建立可靠的产权,而是动员起基层的政治资源及社会资源来筹资兴业。

这本书探索的就是这个隐晦不清、基本上仍是非法的、非正式的金融世界。它根据的是 1994 年至 2001 年间累计近两年的实地调查。该项研究分为三个部分:(1)在福建、浙江和河南三省对小企业家进行的初步调查;(2)采访政府官员、银行经理、地方机关干部和学者;(3)收集与金融业、私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状况有关的文件。调查过程在 1996 年及 1997 年进行了 18 个月,特别具有挑战性。当我带着一捆有文字处理的问卷出入于各个城镇和村庄时,私营企业家们不相信竟会有人对他们不受规章制度束缚的经历感兴趣。

“是工商行政管理局派你来的吗?”福建省安溪县的街头小贩疑心重重地问。

“不是,我只是为一个研究项目来收集资料。”

“那么,我就不必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了,是吧?”

“如果你不太忙,你的回答会对我的研究大有帮助。”

x



店主瞥了一眼成卷的普查问卷，“你的这些表格是干什么用的？”

“我用它来采访私营企业家。”

“然后呢？”

答卷人的疑惧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小企业主要花费巨大的气力来对付国家的官吏。通常，在一天的时间里，菜贩要与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局、公安局、地税局的干部们，还有其他官吏打交道，或者受其骚扰：他们要对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一分子（私营经济者）进行监管和征税。要想做生意，只操心自己生意上的事情是不够的。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我只对他们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出金钱或政治顺从的要求。

在进行了 374 次调查和 186 次正式采访后，我已多次回答了自己的基本问题。私营企业主在缺乏常规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已经发明了一套惊人的非正规金融机制：从不计利息的民间借贷、信贷互助会到更制度化的金融中介公司，比如私人“钱庄”和信用合作社。大多数这类信贷组织富有创造性，它们立足于社区，以方便小企业主。它们大多数也是被中国人民银行所明令禁止的。这类非政府金融机构生存和适应的能力，暴露出党国体制下的国家调节经济中信贷供应能力的基本局限。虽说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为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厥功甚伟，但有时在基层，它们也得靠妥协才能稳定下来。非正式金融业不仅对私营经济至关重要，在政治上也很敏感，而在很多情况下，又具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因此，我应向成百上千位私营企业主和信息提供者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在附录Ⅱ和Ⅲ中都被匿去了姓名。我尽力在规范化和方法论上忠实地把他们的经历和看法呈现出来。

我在问卷调查、正式采访以及文件收集过程中，受益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曲鸿亮（1994，1996—1997）、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何大明（1996—1997）、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1994，1996—1997）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7）的工作人员的帮助。我的研究与写作获得了下列来源的资金支持：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1993—1999）、福特基金会发展中世界研究及研究方法的研讨班（1994—1995）、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ACLS）（1996—1997）、富布赖特—黑斯海外博士论文研究项目（1996—1997）以及哈佛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院（1997—1999）。我衷心感谢上述各方的慷慨资助。

在哈佛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院的两年，为我写作此书的初稿提供了激

发灵感的环境。我作为库金(KuKin)项目资助的研究者,参加了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研讨班,从中获得了有价值的反馈。该班的参加者有:阿尔伯特·阿列斯娜、彼得·黑尔、杰弗瑞·弗列丹、丽莎·马丁和斯蒂夫·傅格尔;在民主实施研讨班中,互相促进的参加者有:乔治·多明格兹、格兹戈兹·艾克尔特、罗伯特·普特南和斯蒂夫·傅格尔;由麦勒·戈特曼协调的费正清中心东亚研讨班;由艾兹拉·傅格尔组织的中国事务项目早餐会;以及由萨缪尔·亨廷顿领导的哈佛研究院本身。我衷心感谢这些研讨班的组织者与参加者。

许多其他的人也对此书手稿的各章节提出了建设性和关键性的评论。我感谢罗伯特·贝茨、马克·布里斯、大卫·布克哈特、阿历山大·库力、萨拉·弗里德曼、大卫·康、斯蒂文·列博、何戴惠丹、洛瑞尔·金达尔、珍妮·欧艾、詹姆斯·洛恩、斯蒂夫·索尼克、布里吉特·威尔士、吴介民、李章,以及我在麻省剑桥的“轮流写作读书会”的成员(1997—1998)——本杰明·里德、伊丽莎白·列米克、亚当·塞加尔、艾里克·索恩和蔡莉莉等阅读了我修改中的著作。在哥伦比亚大学,白思鼎、孔迈隆、黎安友、理查德·纳尔逊以及麦德琳·策林等教授也都提出了思想深刻的建议。我的导师黎安友和白思鼎教授尤为坚持不懈地悉心指导我。

我还得益于同许多人的交谈和通信,他们是路易斯·奥古斯汀·珍妮、理查德·鲍姆、托马斯·伯杰、约瑟夫·波思科、伊莎贝尔·克鲁克、米切尔·克鲁克、崔致远、理查德·多纳、杜小山、南茜·赫斯特、徐斯俭、洪珍、德韦什·卡帕、斯蒂芬·麦克古克、刘文璞、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米切尔·芒特桑诺、阿尔伯特·帕克、弗洛伦斯·帕托万尼、伊莉沙白·佩里、多萝茜·索林格、陶仪芬、任长庆、贾伊·罗森嘎德、托尼·塞克、卡嘉·舍特、帕特里茜娅·索恩顿、艾兹拉·傅格尔、王小艺、安德鲁·瓦特森和吴文太。

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我任艾默里大学(1999—2000)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000—2001)的政治学系副教授。罗杰·海顿在此期间对我帮助很大,他以优雅的幽默感为我提供了及时的反馈,还有黑尔·盖茨和一位匿名读者提供了极好的评论。我还要感谢威廉·康诺利的指导和劳拉·罗克尔在编制索引上的精心帮助。

《中国季刊》惠允我使用发表在该刊 161 期(2000 年 3 月号)第 143—170 xii

页上的拙文“宴会金融业：华南的性别与储贷互助会”。

就更个人的方面来说，我的家庭值得感谢，他们包容我的工作习惯。我感谢大卫·布克哈特，是他在福州为我介绍了第一组研究助手，并在我的研究、写作及修改全过程中帮助我。我的妹妹林达使我在久离纽约后还能在那里有个家。最后，我要感谢父母，特别是母亲凯瑟琳·蔡，她激发起我对本课题的兴趣，对我从事此项研究的价值从未放弃信心，并一直以远超过母亲的慈爱，以一切所能想象得到的方式来帮助我。她是一位真正伟大的女性。

蔡欣怡

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 1  |
| 非正式金融业的政治成果        | 5  |
| 打破常规的国家—社会两分状态     | 8  |
| 向草根活动家学习           | 10 |
| 破解私营经济             | 14 |
| 无法控制：党国体制的潜在教训     | 16 |
| 第二章 中国非正式金融业的政治经济学 | 24 |
| 帝国时代的中国非正式金融业      | 25 |
|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正式和非正式金融业  | 26 |
| 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性变化？      | 27 |
| 银行为何对私营企业关闭大门      | 31 |
| 另一面：当代中国的非正式金融业    | 33 |
| 研究的组织工作            | 35 |
| 研究发现的总结            | 42 |
| 第三章 福建省金融业的性别世界    | 58 |
| 福建的经济与金融环境         | 59 |

|                         |            |
|-------------------------|------------|
| 福州市：欢迎外资和私人资本           | 63         |
| 长乐市(县)：私营企业和私营金融        | 69         |
| 山村：贫困与人口流失              | 73         |
| 泉州市：争取外资的资本主义竞争         | 74         |
| 晋江县/市：从家庭工厂到世界市场        | 80         |
| 惠安县：边缘上的私营零卖            | 83         |
| 安溪县：通过集体企业脱贫            | 86         |
| 福建省调查地点比较的总结            | 89         |
| 信贷互助会中性别差异的复活           | 91         |
| <br>                    |            |
| <b>第四章 温州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管制</b> | <b>113</b> |
| 温州与温州之谜                 | 114        |
| 从被勒索的和谐到干部的名利追求         | 118        |
| 红帽子伪装、挂户企业和股份合作社        | 120        |
| 从信贷互助会到金字塔型投资诈骗手段       | 122        |
| 没帽子,红帽子,硬帽子             | 127        |
| 典当业的周期性发展               | 131        |
| 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         | 135        |
| 官方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干预和监管        | 137        |
| 私营企业家对金融机制的选择           | 142        |
| <br>                    |            |
| <b>第五章 河南省有创造性的资本家</b>  | <b>155</b> |
| 河南的经济结构与面临的发展挑战         | 156        |
| 郑州市                     | 159        |
| 开封市                     | 163        |
| 洛阳市                     | 166        |
| 贫困县                     | 169        |
| 河南对非国有经济的金融资助           | 170        |

|                                |            |
|--------------------------------|------------|
| 硬帽子和艰难时代                       | 186        |
| 对河南金融机构的总结                     | 188        |
| <b>第六章 比较脉络下的场外市场</b>          | <b>199</b> |
| 联结子题目                          | 200        |
| 非正式金融业的宏观效应                    | 203        |
| 作为一柄双刃剑的管制                     | 208        |
| “创可贴”式的补贴扶贫贷款                  | 212        |
| (国家)对基层银行系统的建设                 | 217        |
| <b>第七章 经济可能性的地方逻辑</b>          | <b>231</b> |
| 一个发展型的国家?                      | 233        |
| 地方发展中路径依赖的多样性                  | 236        |
| 经济发展的地方逻辑                      | 240        |
| 一个过渡现象?                        | 243        |
| 企业家式的可能性                       | 245        |
| <b>附 录</b>                     | <b>251</b> |
| 附录 A 研究的方法论                    | 251        |
| 附录 B 1994—2001 年田野调查(非问卷)名单(略) |            |
| 附录 C 1996—1997 年问卷调查名单(略)      |            |
| 附录 D 经营类型的编码(略)                |            |
| 附录 E 信贷互助会的比较性综述               | 263        |
| <b>表 6.1 与附录 E 中引用资料的来源</b>    | <b>268</b> |
| <b>索 引</b>                     | <b>273</b> |

# 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1

严厉打击金融领域各种违法违规现象,必须保证金融法律规章落到实处。要重点制止银行高息揽储、社会非法集资和社会乱办金融……

——《人民日报》,1999年2月1日

1990年代末,正当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北京毅然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它将以国际经济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行事,抵御风暴的侵袭。确实如此,人民币保持了它的币值;宏观经济指数表明,相对来说,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地区金融危机的伤害。

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国内金融不良的症状事实上正在基层积聚。大量的非正式金融中介公司随着经济自由化大潮涌现了出来。另外,官方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及机构的努力,也产生了引发公众不满的不良效应。<sup>1</sup>请看下列事件:

● 1998年11月,河南省郑州市:因一家投资公司垮台而丧失了储蓄的2000多人在省会游行抗议。 2

● 1999年9月,湖南省长沙市郊区:5000农民发起了约50次游行示威,抗议政府关闭农村信贷储蓄基金会的2000家分支机构。

● 1999年1月,重庆市:在一家当地投资公司倒闭后,300人举着毛主席的大幅画像游行,抗议其中的腐败活动。

仅仅提及几例这样的地方危机,就暴露出当代中国非正式金融业不稳定、黑暗的一面。正是这一面,使得中央政府中的有些官员担心头20年经

济改革的步伐太快；使得一党体制下的国家失控。私人金融交易能够破坏国家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滋生投机性的资本投资活动，而且最可怕的是，它会危及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与此同时，很明显的是，非正式金融业也在发展经济中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从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私营经济很显然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3000多万家私营企业在此后的20年间创办起来，但官方的国有银行主要是贷款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直到2000年年底，整个国家银行系统贷给私营经济的资金都不足1%。<sup>2</sup> 私营企业主也把自己被正式信贷来源拒之门外视为天经地义。

当我在私营企业主那里调查，“你从银行里借过钱吗”这个典型的问题时总是能引来生动热烈的回应，如果不把这些回答视为自贬的话。比如：

“你疯了吗？私人老板是不可能从银行贷出款的！”

“我不识字，也没有可抵押的东西，甚至连城市户口也没有，如果是你会借钱给我吗？”

一位饭店老板当着我的面大笑起来，说了一句最令人可笑的话：

“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活过来，叫银行贷给我款，他们也不会干的！”

这些回答产生了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在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系统贷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中的整个私营部分是怎么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如果银行不贷给私营企业家钱，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怎么筹措到资金的呢？

答案很简单：钱是由非正式的而且经常是非法的金融业提供的。私营企业家依靠的是丰饶的非正式金融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从临时的民间借贷和批发商与零售商之间的行业信用，到更加制度化的机制（诸如信贷互助会、基层信用合作社），甚至是提供全方位服务然而未被认可的私营银行。要想从经济层面了解改革时代的私营金融业，为私营企业家服务的光怪陆离的各色非正式金融机构不可忽视，值得大书特书。确实，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中的这样一个核心部分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更突出的部分，而且中国的公开出版物几乎从未承认非正式金融业。它就像是转型期经济之轮中毫不起眼的润滑油——运转中缺它不行，但又无人真正愿意关注它。然而，在显示私营经济增长的国家银行



及国家统计局那靠不住的平衡表背后,人们每天都在合法行为的边缘处打擦边球。成千上万人靠乞求、借款和“偷钱”来创造新的生意、新的生活以及对政策的新的挑战。根据我在1994年至2001年间23个月的实地考察,这本书揭示出精巧伪装下的非正式金融世界,是怎样给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的。

本书也证明了这一点,即非正式金融业的原动力中蕴含着帮助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东西,更广义地说,还有我们思考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方式。非正式金融业被嵌入一个未被讲述过的更大的故事之中,这个故事讲述了私营经济在缺乏完善的产权制度的条件下是如何增长的。中国的私营老板不仅被国有银行拒之门外,而且其经济交往也仅能得到法律的微弱保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私人金融交易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非法的。这些运作的现实向经济增长必须有必要条件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比如,那些接受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影响深远的产权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可能惊奇为何还会有人想参与中国的转型经济。<sup>3</sup>学者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由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繁荣立足于一个界定清晰的法律制度,以此来规范资产的所有权、使用和转移。根据这种观点,在持续执行此制度时,产权就会减少市场交换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并给经济活动者提供促使效率最大化的信息和动力。<sup>4</sup>因此,有人解释说,第三世界的持续不发达是由于它缺乏规范的产权。比如,赫尔南多·德·索托(Ernesto de Soto)就说,如果允许穷人合法地积累、显露和交易他们的非正式财富,他们就会富得多。<sup>5</sup>然而在中国,私营经济活动一直有着惹人注目的扩展。金融企业家、私营生意和有差别的消费者正在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积攒、展露和交易他们的资财。尽管私人产权模糊不清,上述现象却依然在发生;这对资本主义增长的常规理论提出了挑战。

通过产权的视角不能完整地看透中国的转型期经济,因为其经济合理性的假定过分简化了现实生活互动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本书没有聚焦于明晰的产权的缺乏上,而是阐释了私营经济如何以及为何能在明显的无常易变和颇有风险的环境下,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繁荣兴旺。我并非不考虑完善产权的功效;然而,我建议其因果关系的逻辑应重新被界定以适应中国的实际国情。<sup>6</sup>在所谓中国产权不清的范围之内,政治及经济活动者们一直